【国学随笔】

文化养成

□徐宏力

人生要读两种书，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，一种是脚步趟出来的。

孔子是教书的,照理说应该更看重知识,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他在《论语·学而》中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——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这就是说,先要有好的行为,如果还剩下多余的精力,再学文化。似乎念书这档子事儿可有可无一样。不学道,如何行道?孔子的说法肯定极端,一向温良的他,很少如此偏执,看样这次是急了,不惜矫枉过正。孔子有孔子的苦衷,他的某些弟子学风浮泛,成了夸夸其谈的伪君子或者助纣为虐的坏蛋,招来老庄学者们的讥讽,声称“大道废,有仁义”。仁学成了沽名钓誉的雕虫小技,礼教从内部开始衰落,孔子能不激动吗?教育界有句名言:只有教不好的老师,没有教不好的学生。孔子看到自己的弟子文过饰非,情急之下放出狠话,也可以理解。

《论语》曾记载孔子的无奈,他说: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?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,是丘也。”弟子们认为我有秘传内容,没有的,我的所有行为都展示在学生面前,我孔丘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此话传达了一个重要思想:不要光注意老师说什么,他做什么也许更精深,行、走、坐、卧皆是道场,做、止、言、默都是教诲。无字之书是原色国学,“行”本“学”末,身教胜于言教。学生要有慧眼慧根,老师讲的东西你不满意,有时是因为你自己没悟透,老师没办法克服言不及义的困难,孔子曾以“予欲无言”来说明这个道理,万物在默然中生长,生命的精彩是在你不说话的时候出现的,而且你说不说它都会出现。即便是名言,也是“边见”,硬要说透是“惑取“,深度把握被叫做“无言明”,天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太多了,老师要有不言而喻的智慧,弟子要有心领神会的能力。不知我讲课的言外之意学生们是否领会?每次我都设计进去一点儿,可能因为做作,效果不大。

《论语·述而》中有一段孔子的自白:“文,莫吾犹人也。躬行君子,则吾未之有得。”他说,在文化学习方面,自己不比别人差,但是在文化实践方面,自己还没有太多的心得。孔子的自谦说明修学容易修身难。“变化气质,涵养德性”,将优秀知识内化为优良人格,这是获得学者资格的前提,学者首先是行者,只会说,不会做的读书人不是学者,还是学生。

钱文忠先生认为如今的“国学热”是虚热。虚的原因很多,最致命的是说得多、做得少,把国学讲成了故事,而且有些厚黑情节很阴险。王国维1911年在《国学丛刊序》批评说“古人所谓学,兼知行言,今专以知言”。一百多年了,只说不做、只想不做的毛病还没改,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改,是不是就改不了啦?梁漱溟认定“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,而是一种生活”。这话表面上很浅,实际上很深。大众生活方式中的儒雅痕迹,是国学影响的主要示标。余英时深入论述过儒家的“形而下”特征。李泽厚视生活为历史本体,将中国学术特征概括为“实用理性”。刘述先三分主流思想——精神儒家为学统,政治儒家为政统,民间儒家为道统。这都是中国式的现象学结论。国学大于文本,包括行为方式、心性修炼等许多非话语内容,国学本体是学,不是论,离不开生活体验。从著述向行动提升是国学建设的质变。人生要读两种书,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,一种是脚步趟出来的。国学中有“道不远人”的守常之法,民间国学最生动,行为国学最要害,只徘徊在理论与宣传中会产生精神泡沫。想法(理论)重要,说法(文本)重要,做法(行为)更重要,大众的做法最重要。中国智慧眼睛向下,更关注于现实困惑,西方精神眼睛向上,更倾心于上帝之恋。

20世纪的“日常生活批判理论”是西方思想界的突破,它解释常态世界的现代化,寻找现代人的发展途径,弥补了传统哲学遗忘生活的缺欠,“回归人的真实现实”已成为当代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。伽达默尔哲学的核心是实践智慧,胡塞尔对“生活世界”的倾心,维特根斯坦对“生活形式”的剖析,海德格尔有关“日常共存”的观念,加芬克尔的“常人方法学”,都说明“人间哲学”是当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主要倾向之一,比天堂哲学更实在了,有走出书斋的意向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倡导行动哲学,他重视两个维度:一个是观察者,把活动看做客观现象,追求事实性;另一个是参与者,通过话语来调节行动,追求有效性。飘在上帝身边的西方思想家都在软着陆,国学本来就土生土长,更应该有抓地力量。

文化学者不应只是观察者,更应成为参与者,对于国学现状的事实性要清晰,对于国学发展的有效性负有责任。有的学者认为西学教做事、国学教做人,为了强调国学的重要,甚至说要先做人再做事,实际上做不好事的人学不到做人的真功夫,要在做事中学做人,在做人中学做事。为了提高做人的水平与做事的质量,需要将国学建设工程化,设计养成蓝图,落实操作措施,控制变化节点。文化施工是软项目,但应有硬指标。

“少年儿郎,当醉卧沙场,换乾坤朗朗。”继往开来的青年一代处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接合部,应该培养他们的担当意识,国学重点工程的现场在学校。第一课堂传授知识,第二课堂养育人格,第三课堂拓展视野,各有侧重,相互呼应。第一课堂是基础,第二课堂是中心,第三课堂是补充。当下的虚拟社会商业色彩太浓,文化垃圾太多,它的不成熟与不成熟的青年意志形成了叠加效应,政府对此负有管理责任,年轻人也应该以阳光心态参与网络社区建设,创造一个健康文明、适合国学青年成长的博雅环境。

梁启超批评胡适在科学论上的精彩与在实践论上的肤浅,认为国学向现代知识体系转型,要重视养成教育。1897年,他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,依然保留着书院特色,要求学生每天静坐一小时,他制定的《湖南时务学堂学约》十章,一曰立志,二曰养心,三曰治身,四曰读书,五曰穷理,六曰学文,七曰乐群,八曰摄生,九曰经世,十曰传教。其中读书、穷理和学文属于“知”的范畴,其他的都侧重“行”。国学工程更应该学仿《华严经·净行品》,它为修行者设计了一百一十一个生活细节,涵盖了坐禅、化缘、沐浴、安寝等具体生活事项,依此来磨砺性情,培养华严精神。细节不是末节,进入实践精深处,活得才有根基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,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)

梁启超与他的子女

【文化杂谈】

从名人家教的得失谈起

□俞祖华

出身名门,有更显赫的身份背景,有更优越的成长氛围,有更丰裕的家族资源,然而,不是出身豪门、名门的子弟就个个都能成龙成凤。名人家教有梁启超家这样满门才俊的传奇,但也有令人唏嘘不已、深为痛惜的案例。

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的家教就远非完美可言。康有为一生有六位妻妾,生育12个子女,长大成人的有二子四女,长女康同薇、次女康同璧卓有成就,成了女界名流,其他子女就说不上成大器了。梁启超在给其子女的信中提到了恩师一家的乱象与窘境:“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,没有办法。最糟的是他的一位女婿(三姑爷)。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,连偷带骗。南海现在负债六七万,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(他串通他人来盘剥)……他那两位世兄,和思忠、思庄同庚,现在还是一点事不懂,活是两个傻大少(人尚不坏,但是饭桶,将来亦怕变坏)。还有两位在家的小姐,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,比起我们的周姑爷和你们弟兄姊妹,真成了两极端了。我真不解,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,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,弄成这样局面。”康有为身后“萧条得万分可怜”,梁启超得知其死讯后“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,才草草成殓”。

另一位民国名人胡适,与江冬秀育有二子一女,女儿夭折,他颇为自责,“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,也许不会死。我把她糟掉了,真有点罪过。我太不疼孩子了,太不留心他们的事,所以有这样的事。”长子胡祖望虽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,但成绩远未达到父亲的期望,胡适也甚是恼火:“今天接到学校报告你的成绩,说你‘成绩欠佳’,要你在暑期学校补课。你的成绩有八个‘4’,这是最坏的成绩。你不觉得可耻吗?”小儿子胡思杜更不成器,读了两个大学都未能毕业,还染上了赌博等坏习惯,被美国当局驱赶回国。

名人之后未能成器,甚至变坏,家长要承担很大的责任,尤其是父亲,正如俗话所说“养不教,父之过”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:一是因家庭起点高,有的家长甚至想复制自己的成功,故而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值,教育不得法,一旦达不到期望又在心里予以放弃。据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回忆,康师曾把女儿同复送到他这里受教,还说:“此女甚钝,幼时尝教以数目字,至数遍尚不能记,余即厌恶之。”二是家长忙于自己的事业,无暇照顾、管教孩子。维新变法前,康有为还有余暇照管其长女、次女,但对后面几个子女投入不够,子女们后来的发展也就有了差别。胡适自己忙于公务,而妻子是家庭妇女,文化程度不高,使孩子疏于管教。1946年6月16日,胡适在日记里写道:“小三今天毕业,今天又是美国人的Father's Day(父亲节),我很惭愧对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(死了),都没有尽我能够尽的责任。”三是家庭条件优裕,家长对孩子的各种要求都予以满足,娇生惯养的结果是有的孩子骄横、张狂,有的孩子沾染了坏习气,甚至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。

梁启超当年没有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,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,只是要求他们“尽自己的能力去做”。思成后来成了院士,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“希望你回来见我时,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,我就心满意足了”;思永后来成了院士,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“我所望于思永、思庄者,在将来做我助手”;思礼后来也成了院士,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“家里学自然科学的太少了”、“希望达达以下还有一两个走这条路”。他的孩子也有时成绩不好,但他从未埋怨孩子没出息,还说:“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争气,我有什么忧虑呢?”

梁启超当年驰骋政坛,致力启蒙,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身兼数职,社会事务、教学、学术与写作头绪繁杂,但他总是要挤出时间对孩子进行教育,抽空给孩子写信、与孩子聊天、陪孩子娱乐、带孩子看海、伴孩子一起成长。他曾在给思永的信中说:“我现在忙极,要过十天半月后再回你,怕你悬望,先草草回此数行……因为忙,有好多天没有给你们信(只怕十天八天内还不得空),你这信看完后立刻转给姊妹他们,免得姊妹又因为不得信挂心。”

梁启超常和孩子讲“生活太安逸,易消磨意志”、“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,此乃最足以自豪者”,要求孩子们要守住寒门家风;他对孩子的要求不是做大官、发大财、出人头地,而是“做大事,做实事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”。在父亲的教育下,梁家子女个个务实、低调,没有一个以名门之后自居而骄横、张狂的。

(本文作者为鲁东大学教授,著有《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》一书)

唐朝是书法的“尚法”时代,唐人尚法又主要通过楷书体现出来。由于唐代吏部铨选中有“身言书判”四个方面的要求,而对书法的要求中又只强调“楷法遒美”而不涉及其他书体,加之“行卷”风气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历史与现实原因,致使唐朝几乎无人不善楷书,且涌现出一大批如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里程碑式的书法巨擘。即使以草书闻名天下的张旭,也能写出一手极为工整的楷书。可以说,唐人对楷法的建构已达到了壁垒森严、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
既然如此,唐楷为何又面临着尴尬呢?尴尬又在何处呢?我认为,唐楷之尴尬恰恰就是源自其谨严的法度,而法度严谨的直接后果就是令学习者易进难出。法度严谨就有规律可循,所以易进;反过来讲,法度严谨就束手束脚,所以难出。且不管书法界如何看,我一直有一种观点,就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“尚法”时代应是秦朝,而非梁巘等人所谓的唐朝,秦人对小篆法度的构建,丝毫不让唐人。只不过较之唐代,在时间上太短而已。

【书法茶座】

唐楷的尴尬

□杨加深

后人临习前人碑帖,目的不是为了复制前人,而是通过学习发展出自己的风格。这就是书法上讲的“入帖”与“出帖”或“无我”与“有我”的问题。“入帖”、“无我”是手段,也是必经阶段;而“出帖”、“有我”才是目的。所谓艺术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,镣铐就是法,舞得自由与否,要看书法家的本事。如果明知出不来,即使入门再容易,恐怕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学习唐楷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此。

绝大多数人学习唐楷的后果,是除越写越像之外,很难有所突破。拿李邕的话说,叫“似我者死”。颜真卿楷书是唐楷的代表之一,北宋的蔡襄、苏轼都曾先学颜楷而后转学他人;而清代的钱灃,民国的华世奎、谭延闿、谭延泽兄弟等则是忠实的颜门“信徒”,虽穷其一生,然最终亦无一人出鲁公之右。大家尚且如此,常人又何以堪?

这个问题宋人就注意到了。米芾说柳公权是“丑怪恶札之祖”,并说:“丁道护、欧、虞笔始匀,古法亡矣。柳公权师欧,不及远甚,而为丑怪恶札之祖。自柳氏始有俗书……欧、虞、褚、柳、颜皆一笔书也。安排费工,岂能传世……颜鲁公行字可教,真便入俗品。”在米芾看来,欧、虞、褚、柳、颜都是一笔书,这个一笔书,与王献之一行字连绵到底的“一笔书”不同,而是指笔画的程式化,后来的雕版字体多脱胎于唐楷的事实,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唐楷的程式化程度。米芾所说的“匀”就是指此。所以,尽管对颜真卿的行书,米芾认为“可教”,而对其楷书,则认为是俗品了。

此后,元代书法是赵孟頫的天下,主要以二王为宗;明清人虽多善楷书,但从唐楷入手并成名者却寥寥无几。尤其是清末阮元、包世臣、康有为等对魏碑书法的推重,更是让唐楷的尴尬愈演愈烈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一书中专列“卑唐”一节,其中说:

“至于有唐……不复能变,专讲结构,几若算子。截鹤续凫,整齐过甚。欧、虞、褚、薛,笔法虽未尽亡,然浇淳散朴,古意已漓,而颜、柳迭奏,澌灭尽矣……唐人解讲结构……若从唐人入手,则终身浅薄,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……学者若欲学书,亦请严画界限,无从唐人入也。”

今人学书法,唐楷依旧不可或缺,一个最大的原因还是好入门,即易进。然书法创作中,唐楷较之其他书体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。这不能不说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脱节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近年来的褚遂良楷书热,似乎能成为反驳唐楷尴尬的微薄论据,然褚书热的原因,也无非是其尚有些许变化的余地而已。

像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,书法中的任何一种书体,一旦臻于完美,就很难被超越,且法度越完美,发展的路子就越窄。面临这种尴尬,硬着头皮往前走固然不失为一种态度,但更常见的方式往往是敬而远之。这有些类似于唐诗发展到顶峰后,宋人就不得不转而发展宋词一样。无论是印刷术盛行后的古代,还是电脑打字的今天,写唐楷都似乎与书法的艺术性渐行渐远。今天,如何正确对待唐楷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,已经成为当今书坛的重要话题。张旭光先生提出的“激活唐楷”观点,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,但其中所反映的深层背景,也正是唐楷的尴尬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